

深刻把握成就功业的“志”与“勤”

简 复

“功崇惟志，业广惟勤。”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业绩。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功崇惟志，业广惟勤”出自《尚书·周书·周官》，这一古训穿越近3000岁月，蕴藏着干事创业的深层哲理。“志”犹如方向之舵，“勤”就像前行之桨，二者辩证统一、不可分割。

功崇惟志——“崇”有高大、崇高之意，要想铸就崇高功业，首先就要树立远大志向。明代思想家王阳明说过：“志不立，如无舵之舟，无衔之马，漂荡奔逸，终亦何所底乎？”我们把“志”和“向”组词，称为“志向”，没有“志”，“向”便无所依，很容易陷入盲目，也禁不住挫折。

古人历来崇尚立志，无数故事反复印证：志存高远，方能行稳致远；志向不改，方能终有所成。

汉代史学家司马迁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之志撰写《史记》，即使命运多舛，修史立言的志向从未动摇，经过数十年如一日的潜心著述，终成贯通古今、包罗万象的千古巨著，位列二十四史之首，成为中华文化的璀璨瑰宝。

北宋政治家范仲淹年少立下“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的济世之志，毕生追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一生仕途跌宕，无论身在朝堂还是地方，始终志向不变。在泰州主

持修筑捍海堤，抵御海潮护佑百姓，至今仍有“范堤烟柳”；在西北整顿边防、安抚军民，还在当地修建了嘉岭书院；在朝堂上直言进谏，心系底层民生。纵遇坎坷，为民谋利的志向从未消磨，终成士大夫千古典范。

放眼百余年党史，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

20世纪初，正值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之际，无数知识分子苦苦求索救国道路。李大钊写下“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对联，这也是他一生的写照，他坚信马克思主义能够救中国，为理想从容赴死。夏明翰写下“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诗句，以生命捍卫信仰。方志敏写下《可爱的中国》，身处绝境依旧憧憬民族复兴的未来。

长征路上，遵义会议后不久，娄山关之战后，毛泽东写下“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的诗句，展现了红军奋发的斗志、必胜的信心、无畏的勇气。

新中国成立以来，无数榜样践行远大志向。

“两弹一星”元勋们扎根荒原戈壁，以“心事浩茫终不悔，春雷作伴国尊严”之志，隐姓埋名、远离故土，在物资匮乏、技术封锁的条件下攻坚克难，

造出核弹、导弹与人造卫星。

焦裕禄带着“不改变兰考面貌，决不离开”的誓言主动奔赴风沙盐碱肆虐的贫瘠土地，查风口、探流沙、治水患，用生命为民造福。

黄大发立下“水过不去、拿命来铺”的诺言，数十年扎根深山，带领村民绝壁凿渠，使山区群众摆脱缺水困境。

业广惟勤——“广”是讲事业拓展壮大，要实现这一点，离不开持之以恒的勤勉实干。倘若缺少脚踏实地的勤勉付出，一切理想都只是空中楼阁。

回望历史，凡成就伟业者，无一不是勤勉笃行的践行者。

汉代张骞两次出使西域，路途遥远艰险，曾遭遇匈奴长期扣押，多次身陷险境，始终没有放弃使命，历经辗转奔波，路遍西域诸国，开辟丝绸之路。如果没有坚持不懈的奔走，丝绸之路的历史功业便无从谈起。

东晋祖逖、刘琨留下“闻鸡起舞”的历史典故。“中夜闻鸡鸣”即起身操练武艺、研讨方略，常年持之以恒磨砺自身。若无持续精进的勤勉，即便心怀报国理想，也没有能力担当重任。

历史同样留下深刻教训。一些人虽然口上说大志，却贪图安逸、懒于行

动，致使志向脱离勤勉实践，沦为空谈。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自古便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放眼百余年党史，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勤勉实干、不断开拓事业。革命年代的浴血奋战、日夜行军，建设时期的开荒拓土、自力更生，改革开放后的敢闯敢试、攻坚克难，新时代以来的脚踏实地、接续攻坚，既靠理想信念照亮前路，又靠勤勉实干不断筑牢根基、获得发展。

新的征程上，我们需要深刻读懂“志”与“勤”的内在逻辑，充分发挥“功崇惟志，业广惟勤”这一古训的时代价值，坚定信心、接续奋斗。

大道至简，实干为要。宏伟目标不会自动实现，一切成就依靠实干创造。我们要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摒弃歇歇脚、松口气的懈怠思想，持续提振干事创业精气神，发扬钉钉子精神，以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对于既定目标一抓到底，不半途而废、不浅尝辄止。要正确处理潜绩与显绩的关系，甘于做铺垫性工作、甘于抓长期性任务，不贪一时之功、不图一时之名，要力戒形式主义，精简不必要流程，把更多时间和精力投入办实事、解难题之中，不断创造新业绩，奋力书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崭新篇章。

发挥数智技术优势 不断夯实中华文化传承根基

赵红伟

数智技术的深度应用，正深刻改变着文化资源的保存方式、传播表达形式与受众体验。越来越多藏于馆藏、散于民间的中华文化资源，借助数智手段走出相对封闭的空间，融入当代大众的文化生活。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思想智慧与人文精神，蕴含着丰富厚重的文脉传承。推进中华文化传承的数字化，须坚守文化本位，把握好文化内涵与技术应用的关系，以文化定力驾驭技术手段，不断夯实中华文化代代传承的根基。

厘清数智赋能中华文化传承的内在逻辑

传承中华文化，需要不断传承文明积淀的思想智慧、人文精神与文化基因，数智技术是中华文化保护、传播与转化的重要工具，二者需要实现目标与路径、内核与载体的有机统一。中华文化的传统资源很多依赖实体保存、线下场景传播，受时空条件制约。数字化采集、云端存储等技术应用，既能实现珍贵资源永久留存，也能突破地域壁垒，有效延伸中华文化传承辐射范围。

在此过程中，需要明确的是，技术应始终服务于文化传承，绝不能本末倒置。若片面追求视觉特效、流量热度，弱化对中华文化深层精神意蕴的挖掘阐释，再多样的技术形式也只是缺乏灵魂的空壳。只有以文化内涵为核心，让技术围绕传承目标发力，才能实现形式与内核统一。文化是文脉传承的根与魂，数智技术是助力传承的桥与路，二者同向发力，有助于推动中华文化在数智时代行稳致远。

中华文化数字化建设的实践进展与提升方向

我国文化数字化建设有序推进，阶段成效已初步显现。古籍、非遗等各类文化资源相继完成数字化转化，数字展馆、文史短视频等传播载体不断涌现，既拉近了公众与传统文化的距离，也为深化文脉传承筑牢了坚实基础。

校园教育领域的落地成效尤为突出，各地陆续推出适配教学需求的数字文史课程、线上研学产品，推动文脉资源融入日常教学，也为偏远地区共享优质文化教育资源创造了可能。比如，天津科技大学打造的《数智赋能，“津”彩非遗》虚拟现实实践项目，以本土泥人张彩塑为核心搭建云端沉浸式展厅，完整复刻传统泥塑创作工序，覆盖校内师生及周边中小学千余人，成功入选教育部“数智未来”焕活传统文化案例优秀作品名单，为高校层面的文化育人提供了可参考的落地样本。

同时也要看到，文化数字化建设还处于深化提升阶段，仍有优化的空间。部分数字文化产品重形式、轻内涵，对文化中的精神意蕴挖掘不深；文史研究、教育教学与技术研发的跨界协作机制尚不健全，人才协同效率有待提升；一些区域、机构的数字资源标准尚未统一，资源共享效能未充分释放。这些都是今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着力点。

数智赋能中华文化传承的实践路径

夯实中华文化传承根基，要始终坚持文化本位原则，以内涵建设为核心，以技术应用为支撑，统筹推进内容创作、育人融合、协同联动、保障支撑各环节，推动文化数字化传承提质增效。

第一，深挖文化精神内核，锚定数字内容创作本位。坚持内容为先的创作原则，让挖掘文化中的精神内核贯穿数字产品创作全程，深入梳理各类文化资源承载的人文理念、历史逻辑与审美价值，摒弃片面追求视觉冲击、流量效应的创作倾向，让技术真正服务于文化内涵的精准传达。开展历史场景数字复原、传统技艺数字演绎时，既要兼顾呈现形式的新颖性与吸引力，更要保障文化内容的真实完整，让受众在数字化体验中感知文化背后的精神底蕴。

第二，立足受众认知差异，搭建分层分类传播体系。本质是不断增强公共文化数字内容的供给能力，提升文化传承的精准度与覆盖面。结合不同场

民族地区非遗活态传承与经济协同发展研究

刘曼琳

国家持续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工作，为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提供了政策支撑与保障体系，引导民族地区深入探索文化资源深度发掘与转化利用的发展路径。非遗是联结区域文化资源与经济发展的重要桥梁，其活态传承实践有助于延续文化根脉、维系文化多样性；同时，民族地区非遗独特的文化属性与资源禀赋，也能为区域经济结构优化与内生增长动力培育提供重要支撑。

民族地区非遗活态传承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

（一）产业价值：催生特色文化产业集群，优化区域产业结构。依托民族地区非遗独特文化禀赋释放产业价值，培育具备差异化优势的特色文化产业集群，助力破解传统资源主导型产业的经济结构。在资源禀赋与市场需求的双向适配过程中，可围绕传统技艺、民俗表演、民族医药等非遗项目逐步延伸出涵盖创意设计、生产制作、展示交易、体验服务在内的完整产业环节，带动相关配套业态在地化集聚。而这类根植于本土文化土壤的产业形态具备较强的不可复制性，有助于解决同质化竞争等相关问题。

（二）民生价值：拓展本土化增收渠道，带动居民就近就业。根植于本土社区的非遗传承模式，既能够为掌握核心技艺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提供稳定的技艺变现路径，也能够为普通居民提供参与基础生产环节、配套服务环节的就业机会，使其获得相应收入。随着非遗相关业态的不断拓展，

就业岗位类型也会逐步覆盖技艺习、产品制作、接待服务、运营管理等多个维度，以适配不同年龄层与不同知识背景的劳动力需求，在提升居民收入水平的同时强化社区的内生发展活力，为民族地区的民生保障与社会稳定提供持续的经济支撑。

（三）品牌价值：塑造区域文化标识，提升区域综合竞争力。承载传统文化记忆与独特文化基因的非遗项目，是区域文化形象构建中非常具有辨识度的要素，在文旅推广、产业招商、产品营销等各类应用场景下，拥有鲜明的差异化竞争优势。这类文化标识的持续传播不仅能够强化外界对区域发展品质的认同，还能推动区域在更大范围的竞争格局中占据有利地位，实现文化软实力向经济硬实力的有效转化。

民族地区非遗活态传承与经济协同发展的路径

（一）延伸产业链条，打造特色文化产业集群。在坚守非遗核心技艺传承底线的前提下，推动非遗资源从单一的生产环节向全链条价值释放转型。广西来宾金秀瑶族浴汤这项植根于大瑶山山地生态与瑶族世代医药传统的非遗项目，其产业发展路径恰好为这一转型逻辑提供了可参照的现实样本。在产业前端，当地依托县域原生山地生态与药用资源禀赋建成标准化瑶药种植育苗基地，通过与本土特色种植业的深度联动搭建起品质可控的原料供给网络。在生产环节，以完整保留传统瑶药配伍炮制技艺为重要

前提，针对性研发出瑶浴包、浓缩瑶药精华、草本养生洗护品等适配现代消费场景的衍生品类。在市场终端，则布局线下康养体验门店，并打通电商直播等兼具产品销售与文化传播属性的多元路径。这些共同构建起技艺传承存续与产业价值增值双向赋能的良性发展格局。

（二）塑造区域非遗IP，提升品牌市场竞争力。在挖掘民族地区非遗的经济价值时，相关单位需要以承载独特民族记忆与深层文化基因的本土符号体系为支撑，通过非遗IP的系统性塑造构筑起难以被市场复刻的差异化竞争优势。以广西桂林瑶族茶俗的IP实践为例，视觉设计环节可从融合瑶绣传统纹样、古法制茶器具形态与待客礼仪表达的民俗文化系统中提取创作素材，在恪守民俗文化原生内涵边界的前提下完成现代化视觉转译，构建覆盖产品包装、门店空间、文旅导览等多元应用场景的统一视觉体系。进入IP运营阶段后，借助世界级非遗的认证优势，对接航空、新茶饮等领域具备成熟市场渠道的品牌，展开跨界联动，推出联名衍生产品；依托国际茶文化节展会与城市文旅节庆活动，搭建线下深度传播场景；辅以分级授权的商业管理模式，对IP价值的释放路径加以规范，使长期沉淀于乡土的文化符号逐步转化为具备持续变现能力的市场资产。

（三）拓展“非遗+”多业态融合场景。其一，借助文旅产业持续升温带来的广阔市场，将非遗传习、技艺展示、民

俗体验嵌入既有旅游线路与景区业态体系，打造具备沉浸感的民族文化体验项目，在丰富文旅产品文化内涵与体验层次的同时带动文旅消费的提质升级。其二，在乡村建设的整体布局中引入非遗资源，依托在地非遗项目打造差异化的特色文化村落，将非遗元素系统性融入乡村公共空间营造与民宿业态培育过程，推动乡村风貌提升与特色产业发展的有机结合。其三，针对研学教育领域不断增长的实践需求，开发体系化的非遗主题实践课程与研学线路，在为不同年龄段学习者提供深度接触民族文化渠道的同时，带动研学经济的区域发展，帮助非遗资源突破传统传承场景的局限，在更广泛的经济社会领域释放文化价值。

结语
民族地区非遗活态传承与经济协同发展是兼顾文化保护使命与经济发展需求的可持续发展路径，能够在延续民族文化根脉的同时，为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的内生动力。未来，随着文化消费市场的持续升级与数字技术的不断赋能，二者的协同空间将得到进一步拓展，在更多实践场景中探索出可复制、可推广的成熟模式，为民族地区文化繁荣与经济成长的有机统一提供坚实且长效的发展支撑。

（作者系桂林医科大学人文与管理学院讲师。本文系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一批育苗人才资助科研项目“广西瑶医药资源挖掘与民族医药文化发展研究”的成果）

数字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价值认同与社会责任探析

耿宏宏

念，均能够为数字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深厚的文化滋养。数字技术的日新月异，不仅使传统生态文化的活化传承拥有了数字化博物馆、生态文化云平台、非遗技艺直播等新载体，也让敬畏自然、和谐共生的传统理念融入现代数字生活，增强了公众对数字生态文明的归属感。

马克思主义的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关系，能够为数字生态文明建设奠定重要的学术支撑。人与自然是物质、能量、信息不断变换的双重关系，人在利用劳动实践改造自然的同时，也应理性遵循世界的因果规律。因此，应巧妙利用短视频、互动科普、虚拟体验等形式重塑生态理念的传播格局，促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等理念进一步转化为大众共识，进而形成全社会共同遵循的数字生态价值准则。

数字生态伦理作为规范数字行为、防范技术异化的道德框架，能够有效助

力数字生态文明建设，使其不至于陷入数据滥用、算法歧视、电子垃圾污染、数字鸿沟等伦理风险，构建起以尊重自然、公平普惠、科技向善为重要内涵的价值认同，引导数字技术研发与应用坚守生态底线，推动技术创新服务于生态保护与可持续发展。

社会责任：数字生态文明建设的行动保障

数字生态文明建设作为系统工程，势必需要政府、企业、公众、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的协同履责，唯有如此，方能搭建起全方位、多层次的社会责任体系，将价值认同转化为具体实践。

作为数字生态文明建设的主导者，相关部门应不断完善顶层设计，健全数字技术绿色应用、电子垃圾回收、数据中心节能降碳等领域的法律法规，加强数字生态监管，运用大数据、卫星遥感等技术构建生态环境监测网络，提升污

染治理、生态修复的数字化精准度。此外，应推动数字普惠与生态公平，缩小城乡间、区域间的数字差距，保障弱势群体平等享有数字生态资源的权利。

企业是数字技术创新与产业发展的重要主体，应将生态责任融入生产经营的全过程。数字科技企业可研发绿色低碳技术，优化数据中心能耗结构，推广节能算法与清洁能源应用；传统产业可借助数字技术实现智能化绿色转型，推动生产流程低碳化、供应链循环化；平台企业需要承担生态传播责任，抵制虚假环保信息，引导用户践行绿色生活方式，实现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的统一。

公众是数字生态文明建设受益者与参与者，其责任意识与行为选择直接关联着数字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因此，应提升公众的数字生态素养，使其自觉践行绿色上网、低碳消费、垃圾分类、电子废弃物规范处理等行为，主动参与

线上生态监督、公益环保活动，及时举报环境违法行为，进而形成人人有责、人人尽责的数字生态共建格局。

环保组织、行业协会、公益机构等社会组织应发挥纽带作用，开展数字生态科普教育、公益项目策划、第三方监督等工作，推动生态文化传播与责任落实，协助政府开展生态调研，引导企业规范履行生态责任，组织公众参与数字生态实践，努力弥补政府监管与市场调节的不足。

结语

数字生态文明建设是技术革新、文化重塑与责任重构的协同过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蕴含着丰富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深入挖掘其中蕴含的丰富内涵，有助于不断夯实数字伦理与生态保护的文化根基。将传统生态智慧与现代数字伦理融入国民教育、社会宣传与企业文化建设，通过校园科普、媒体传播、公益活动等形式，培

育人们对数字生态文明的认同感。在此基础上，凝聚责任共识，引导多元主体明确自身责任边界，将生态价值理念内化为行为自觉。此外，要把价值认同转化为可操作、可考核的责任机制，突破主体壁垒，建立政府、企业、公众、社会组织联动机制，搭建数字生态共治平台，开展跨领域、跨区域合作，推动数字技术与生态保护深度融合，促进生态数据与治理经验共享，提升数字生态文明建设的系统性与持续性。但是，也应警惕算法茧房、信息污染对价值认同的消解，杜绝以技术创新为名逃避生态责任的行为，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生态优先，确保数字技术始终服务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使数字生态文明建设既有文化温度又有责任力度。

【作者系榆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本文系榆林大学博士科研基金启动项目“新时代数字生态文明的伦理意蕴与建构路径研究”（项目编号：2025GK05）、陕西省教育厅项目“新时代美好生活的伦理向度研究”（项目编号：24JK0271）、榆林大学思政专项项目“青年知识分子群体在榆林地区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中的革命实践研究”（项目编号：SZ2409）的阶段性成果】